美國書話

喬志高

「後屋居士」的隱秘

民國二十年秋，我轉學燕京大學唸新聞學系，系裏一位兼任講師是路透社北平記者孫瑞芹。孫先生指定班上課外閱讀的書籍中有兩本 Bland and Backhouse 合著的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和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根據黎東方的中文譯名是：「〔慈禧〕太后統治下之中國」和「北京朝庭的編年史史料與回憶錄」。）前者有中文本，書名「慈禧外紀」，又有引作「清室外紀」者，不知是否同一譯本。

當時大概是偷懶吧，並不記得把這兩本與功課沒有太大關係的外國人寫中國歷史背景的書找來看過。可是最近有機會讀到新書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社）（黎譯：「拔克浩斯爵士秘史」），才對這位英國「漢學家」——也許應該說「冒險家」或「怪人」——發生很大的興趣。今年感恩節，我弟弟請我去安娜堡他家小住一週，我就順便利用密西根大學圖書館，把「慈禧外紀」原書借出來翻閱一過，藉此彌補多年前所欠的課外作業。歸來後接到「傳記文學」十月號，喜見黎東方教授爲「拔克浩斯爵士秘史」及其作者，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特累孚—羅勃爾 Hugh Trevor-Roper，作了詳細的評介，文中將兩人簡稱「拔爵士」和「特教授」，而且把一部千頭萬緒、書中有書的傳奇故事爬梳清晰，細說分明，實在是書評中的佳作。

「拔克浩斯」（意譯「後屋」）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他二十五歲時來到中國，於一九四四年死在日軍佔領下的北平。他因爲「精通華語」，最早當過英國公使館的「通事」，隨後擔任倫敦泰晤士報兩位駐華記者的助手。這兩人一是該報有名的特派員瑪理遜 G. E. Morrison——北平王府井大街在外國人口中一向就叫做「瑪理遜街」，一位是該報上海通訊員布蘭德 J. O. P. Bland，也就是後來和拔爵士合夥著書的人。此外他前前後後又做過收藏家，曾經把大批中國善本書和手稿捐贈牛津大學包德里圖書館；英美商行的經紀人；和第一次歐戰期間代表英政府在中國秘密收買軍火的特務。單憑這些活動，在幾乎半世紀的期間，這位早期的英籍「中國通」似乎不能稱爲「隱士」，最多祇能算是有很多「隱秘」的「居士」。一直到他年近古稀，一生的「事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才杜門不出，尤其是拒絕與北平其他的英僑來往。

一九七三年特教授偶然從第三者手中接收過來兩卷拔爵士回憶錄的原稿，是他臨終時託付駐北平一位瑞士外交官轉交牛津保存的。特教授打開稿子一看，大吃一驚，這部回憶錄不但是透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和中國滿清末年的一部離奇怪誕的自白，而且連篇累牘盡是毫不隱諱的猥褻記載，包括他本人跟法國詩人維爾蘭（Paul Verlaine）、英國唯美派文人王爾德（Oscar Wilde）、和後來做到英國首相的羅斯伯里爵士（Lord Rosebery）等聞人的同性戀，以及在拳匪之亂後怎樣做了西太后的「入幕之賓」。特教授爲好奇心驅使，花了兩年多功夫，四處搜集資料、勘察官私擋案、尋求證據，用史家的眼光和學者的精神去重新塑造出「

後屋居士」的原形，結果暴露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說謊者，他的一生事業是個不折不扣的大騙局。他捐給牛津和大英博物院的「珍藏」有許多是贋品；他代表英國造船公司和美國鈔票公司沒有拉到生意反而騙了幾筆佣金；他在中國內地軍閥手中採購的大批槍械完全是紙上談兵。這部回憶錄的滿紙荒唐，使特敎授肯定此人是一個誇大狂和精神病患者。他有無比的想像力，能把自己脫胎換骨化成歷史人物而重演一些醜聞醜事，又好似受了一種不能自已的逼迫，立志要遺臭萬年。

所謂的「景善日記」

截至本書出版爲止，「後屋居士」的眞面目始終沒有被人揭穿。他無疑有他的才氣，對於語言、文學和歷史都有相當素養。「慈禧外紀」一書，由他翻譯中文資料，提供初稿，他的合着者布蘭德加以編輯和潤色，出版後雖然哄動一時，但內容的可靠性早已有人質疑。所根據的「第一手資料」中有所謂「景善日記」的，據拔爵士說是八國聯軍進佔北京城後他親手從火中搶救出來的殘稿。這部文獻的眞僞尤其是歐美漢學家幾十年來爭論的焦點。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原版是一九一〇年倫敦漢納曼公司 William Heinemann 印行的。（黎文誤作摩累公司 John Murray，因特敎授曾提到有安諾德 Edward Arnold 和摩累兩家書局先後考慮過而未接受這部書稿，然後才由漢納曼出版。）一九一四年又由波士頓的胡登・密夫林公司 Houghton Mifflin 出美國版。全書五二五頁，分二十八章，從那拉氏的幼年和家庭背景敘到「老佛」駕薨，語多頌揚，是一部很堂皇的歷史人物傳記。書中還有精美插圖三十一頁，其中包括皇太后的玉照多幅，御筆「仿米南宮」的山水畫，太監李蓮英「借銀票壹千五百兩」的便條手跡，和「景善日記」原稿一頁的影印。景善（一八二三——一九〇〇）是滿洲正白旗人，翰林出身，官至禮部右侍郎，是清庭一個不重要的角色，庚

子前六年以「才具平庸」致休。拔爵士居然獲得他在義和團動亂高潮時的親筆日記，內容一五一十記載宮闈秘聞，還有西太后、光緒皇帝倉皇出走，珍妃被推死井底等戲劇性鏡頭，翻成英文做爲全書骨幹，難怪書出後一舉奠定了拔爵士的聲名——而日記原稿三十九頁由作者捐贈大英物博館，從此也就成爲這個洋騙子的狐狸尾巴。

曾有一段時期，「景善日記」普遍被中外人士接受，認爲是中國近代史中難得的原始資料。中文本「慈禧外紀」的譯者自然把第十七章的「日記」全文，連同書中其他許多清庭文獻，原封不動地重譯回中文。此外幾十年來有關清史的中文編著也有不少引用「景善日記」或把它當爲資料整個收入的。根據特教授的追溯，最早口頭指斥「日記」爲假造的乃是拔爵士的首任老板瑪理遜博士。可是瑪理遜不諳中文，拿不出證據，不敢公開爲文指控，而且當時大家知道瑪理遜與布蘭德兩人私仇很深（一半也是拔爵士從中挑撥的），因此也不會予以置信。在學術界支持「景善日記」最力的有荷蘭漢學泰斗戴文達 J. J. L. Duyvendak（雖然後來他改變了論調）和一度當過宣統皇帝洋太傅、後來任倫敦大學中國語文教授的莊士敦爵士 Sir Reginald Johnston。持相反意見的也有美國耶魯大學教會史教授拉杜賴特 Keueth Scott Latourette 和義大利外交家兼作家瓦利 Daniele Varè 等，但都是因爲證據不足，同時懾於布蘭德和拔爵士兩位專家的威信，不能定案。一直等到一九三六（民國二十五年），正當北平法國書店老闆魏智 Henri Vetch 準備替此書出第三種版本時，才有一位旅華英國報人劉逸生 William Lewisohn 發表文章，用謹嚴的考據方法證明「日記」破綻甚多，是拼拼湊湊，嚮壁虛構的作品。中國學者方面，最權威性的一篇研究論文是程明洲在「燕京學報」廿七期（一九四〇年六月號）刊登的「所謂『景善日記』者」。程先生從文筆、史實、日期、邏輯等各方面，列舉數十條例證，認爲這篇東西「剽竊部份之藍本，當不僅一二種，實作僞者據摭當日報章小册所載之有關拳亂者，曲爲編綴，據爲己有以成者也！」

以上各種說法，特教授在他的參考書目中都一一有所交代。他指出所有揭發「景善日記」的學者都是根據

所謂「內在的證據」internal evidence。他們斷定「日記」是有人僞造的，而且認爲僞造的目的是替軍機大臣榮祿洗刷罪名，可是從來沒有人指控拔爵士本人或懷疑他在兵荒馬亂中搶救「日記」的那段故事。現在有了後屋居士這部從未見過天日的「回憶錄」，特教授肯定地下結論說：發現「日記」的經過及其他前言不對後語的種種提供，都是不攻自破的「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僞造「日記」的不是別人，正是拔爵士自己。特教授不是從漢學家的觀點，而是從變態心理的觀點出發，鑽研這位仁兄的個性和生平，抽絲剝繭，一步一步逼緊，誠如黎東方教授所說，全書「高潮疊起，懸疑相繼」，作者用「老吏定讞」，也就是英文所謂「文學偵探」literary sleuth 的手法，終於指出罪魁禍首，使讀者拍案叫絕。

時代的產品

特教授不但筆底下鐵面無私，而且還帶有英國人「輕描淡寫」understatement 的幽默。最滑稽的是他描寫拔爵士不以「景善日記」自滿，每隔幾年還繪影繪聲、若隱若現地提到更精采的「李蓮英日記」（洋洋一百五十萬言），說是早已送到倫敦 Lloyds 銀行的保險庫裏妥爲收藏，去查看時又是子虛烏有！究竟拔爵士的中文造詣如何？根據一般西人學習中國語文的經驗，儘管能說能唸，獨力寫作又是另外一回事。要寫出「景善日記」這種雖然被目爲拙劣的文言文來，也是不可能的。當然，他祇承認自己是翻譯。他的兩位雇主，瑪理遜和布蘭德，都是中文一竅不通，而且鄙夷學中文這回事。當時其他旅華西人中能識之無的也是鳳毛麟角。在這種語言隔閡的鴻溝裏，「精通華語」的拔爵士不消說大有活動的餘地了。「秘史」中提到拔爵士畢生有兩個志願，一是要出版一部漢英大詞典，並且聲稱全部原稿已送存牛津波德里圖書館，祇待醵資付梓。有人去查看，發現祇有幾本練習簿，裏面抄錄了一些不知所云的中文字句。他戀戀不捨的第二個大企望是想被聘爲牛津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教授，但是因爲捐贈贋品文物、亂開空頭支票，他這個教授夢臨了也是一場空。

拔爵士之所以能唬人一世，一半也由於清末民初時代外國人在華地位的優越。他自己出身貴胄，雖然有時窮途落魄、吊兒郎當，但是人溫文爾雅、談吐不俗，晚年道貌岸然，一票白鬍子，不知者望而起敬。特教授蓋棺論定，認爲拔爵士代表他的時代，一個「世紀末」的典型——以騷人雅士始、狂人囈語終。

話說回來，「拔克浩斯爵士秘史」這部書本身也可說是它的時代的產品。近年來有許多書專門暴露維多利亞時代人物強自遏制和隱藏的性生活。這年頭關於同性戀的小說和非小說書籍更是充斥英美市場，恐怕也是反映現實。特教授自己對這兩種題材似乎特別感覺興趣，他喜歡寫翻案文章，拆穿冒牌名人的底細、挖掘贋鼎英雄的泥脚。第一次大戰後名噪一時、綽號「阿拉伯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的「民族英雄」也是他抨擊的對象之一。奇怪的是這位叱咤沙漠風雲的「文豪」和「戰士」也被人發覺有變態性心理的行爲。在「心理歷史」psycho-history 和「心理傳記」psycho-biography 風行的今天，對這位牛津大學教授來說，「後屋居士的隱秘」眞是送上門來的大好材料了。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月於瑪利蘭州

註：直譯「北京的隱士：艾德門•拔克洛斯爵士的隱秘生活。」此爲一九七七年四月紐約克諾夫公司 Alfred Knopf 美國版的名稱。原版係英國麥美倫公司 Macmillen 早一年在倫敦印行，原書名是 A Hidden Life: The Enigma of Sir Edmund Backhouse（「隱秘的一生：艾德門•拔克浩斯爵士之謎」。）